

# 新中国成立以来中译外文学翻译话语研究:内涵与路径

耿 强

(上海外国语大学 语料库研究院,上海 200083)

**摘要:** 1949年新中国成立至今,国内外中国文学外译的实践产生了大量直接和间接有关中国文学翻译的一套认识、陈述和知识。它们广泛存在于各类文本之中,构成了中译外文学翻译话语的知识仓库。本文认为它应该作为一个独立的研究领域,围绕行为者、产品、事件和范畴四个方面,综合使用文本分析、阐释学、社会学、口述史和语料库等方法与手段,展开共时和历时的研究,这对丰富中国翻译话语的内涵,构建具有中国气派和中国风格的翻译话语体系,指导中国文学翻译实践具有重要的价值和意义。

**关键词:** 中译外;文学翻译话语;知识仓库;内涵;路径

## Study of Discourse on Translating Chinese Literature Since 1949

*GENG Qiang*

(Institute of Corpus Studies and Applications, Shanghai International  
Studies University, Shanghai 200083, China)

**Abstract:** After the founding of New China in 1949, the translation of Chinese literature commenced in large quantities at home and abroad. Accordingly, voluminous meta-discourses have been produced, which formed an expansive body of concepts, statements and knowledge about what, how and why to translate. It exists in a wide range of texts, generating a knowledge repertory for translating Chinese literature. This article argues that such a huge body of knowledge about translating Chinese literature deserves to be treated as an independent area for critical interrogation, which is suggested to be conducted from both synchronic and diachronic dimensions, centering on agents, products, events and categories, by resorting to an assortment of methods including textual analysis, hermeneutics, sociology, oral history, corpus linguistics, to name just a few. This integral and systemic study will enrich Chinese discourses on translation, constructing a translation discourse system with local characteristics, and guiding the practice thereof.

**Key words:** translation from Chinese into foreign languages; discourse on Chinese literary translation; knowledge repertory; connotations; methods

### 1. 前言

主动将中国文学译出去构成了自1949年新中国成立至今中国翻译实践的一个有机组成部分。相应地,中国发生的日新月异的变化,尤其是文学发展的状况也不同程度上影响了国外对中国文学的译介。双方同时进行的翻译实践活动除了产生大量的中国文学译本之外,还留下了

一批批有关翻译的种种评论、思想、观念和理论。它们以多样的方式藏身于论文、书评、访谈、随笔、漫谈、日记、笔记、专著、译本的前言与后记、图书封底、网络时评、回忆录甚至是书信等等五花八门的形式之中,构成了本文所说的中译外文学翻译话语的知识仓库。对它们的历史谱系进行知识打捞和学科建构,可以帮助我们在基于外译中实践上形成的中国主流翻译话语之外开辟出一条支脉,充实整个中国翻译话语的内涵,构建真正具有中国风格和中国气派的中译外的翻译话语体系,更有效地指导中译外的实践。本文明确提出新中国成立以来中译外文学翻译话语应该作为一个独立而自足的研究领域,并对这一研究的概念与现状、内涵与路径等问题进行初步探讨,以期就教于方家。

## 2. 概念与现状

“文学翻译话语”是指和文学翻译直接或间接相关的一套认识、陈述和知识,涉及的内容包括比如为什么翻译、如何翻译、为谁翻译、翻译得怎样等等。本文所说的文学翻译涵盖小说、诗歌与戏剧三个类型。与翻译话语类似的概念还有译论、翻译观、翻译思想、翻译理论(陈福康 1992, 2010;王秉钦 2004, 2018;廖七一 2010;张思洁 2006;邵有学 2018)。本文使用话语一词,主要是考虑它能充分包含历史与现实的复杂和多变,允许我们根据研究的实际需要扩展考察对象的范围(Martha Cheung 2006;张佩瑶 2008)。翻译思想一般指的是著名翻译家的翻译观,很少用来描述普通译者所表达的观点和认识。这些东西零散随意,具有偶发性,其原发状态难以直接上升到体系性的翻译思想或理论层面,因此常常被弃之不用。这样做的后果,使得历史书写充满了名人名言,好处是叙述线索看起来平滑完整,但这样的翻译思想史存在很大的不见(陈福康 2010;王秉钦 2018)。相比之下,翻译话语的灵活性可以将翻译思想史不太可能考虑的文本纳入自己的视野,比如《在延安文艺座谈会上的讲话》(毛泽东 1942/1950)关于如何处理中外文学和文化遗产的论述就可以视为一段时期中译外翻译话语的一个组成部分。

中译外文学翻译话语是在中译外文学翻译实践的基础上自然产生的结果。自 1949 年以来,从事中国文学译介的发起者既包括中国也包括外国,结果形成了两套并行的翻译话语。就中国方面而言,中译外的翻译话语由于翻译实践的形式、对象和特点不同于外译中的翻译实践,结果形成了独特的翻译话语形态和样貌。大致来说,实践形式方面,中译外的翻译实践被纳入政府外宣机构的日常工作,翻译采取集体合作的形式且规模庞大,组织方面更加集中、有序、高效。对象选择方面,一方面强调作品的经典性,一方面强调译介的及时性,将中国文学的最新动态介绍出去。译介目的方面,中译外文学翻译实践背后的文学外交思维十分突出,翻译中国文学主要不是为了批判某种意识形态,而是为了塑造积极正面的中国形象。这些构成了一种独特的中译外文学翻译话语。

另一方面,外国主动引入中国文学的实践也产生了大量的翻译话语。从 20 世纪 50 年代开始,外国翻译中国文学主要为了了解中国,通过中国文学了解古代中国社会和文化,通过现当代文学,捕捉发生在中国社会的思想变化与精神心态。当然,也不排除翻译是为了从中国文学或经典中汲取古老而长青的中国智慧。自中国在 20 世纪 70 年代末实施改革开放政策以来,国外对中国当代文学的翻译渐成热点。文学之用趋向多元,翻译目的也从“了解”向“理解”深化。虽然它离敲开西方“古老而坚硬的心灵”(厄普代克语)还为时尚早,但在这个基础上所产生的翻译话语值得我们给予关注并展开对话。比如杜博妮(McDougall 2011)从人类学视角出发提出中国官方翻译的威权模式以及民间翻译的礼物交换模式。她提出的文学翻译的“快乐原则”(pleasure principle)(McDougall 2007)和葛浩文的“我译故我在”的理念有着内在精神上的一致(季进 2009)。葛瑞汉(Graham 1965)在唐诗翻译基础上提出中国古典诗词翻译不能交给中国人去做。他的观点在半个

世纪之后引起中国学者的批评和争论(潘文国 2004)。这些隐藏在文本之山的珠玉金石足以构成一个富足的知识仓库,补充完整中国翻译话语被历史遮蔽的同样鲜活精彩的另一面。

可惜的是,无论是中国本土的中译外文学翻译话语还是国外产生的中国文学翻译话语,均在各自的翻译话语脉络中处于隐匿失声的尴尬状态,经历了“双重边缘化”(耿强 2018a)。

中国现有的翻译理论体系中并没有给它留有位置(董秋斯 1951;郭建中 2015;罗新璋 1984;谭载喜 1999)。“案本-求信-神似-化境”(罗新璋 1984:19;庞秀成 2010)为特点的自成一体的中国翻译话语体系也几乎从未将目的语文化系统内的中译外翻译话语视为一种可以利用的资源(刘建珠、穆雷 2017;王宏印 2003)。

二战后至今,西方翻译理论史很少关注中国文学翻译的情况。除了鲁本·布劳尔(Brower 1966)主编的《论翻译》收有方志彤(Achilles Fang)谈中国古典作品翻译的问题,从西方几本影响很大的翻译著作或翻译理论文集来看,很难找到和英汉互译相关的人物或思想(Bassnett 2002; Robinson 2002; Steiner 1998)。唯一的例外是庞德。他的翻译思想在劳伦斯·韦努蒂(Venuti 2012)编的《翻译研究读本》,以及牛津出版的《翻译理论与实践历史读本》(Weissbort & Eysteinnsson 2006)中占有特殊位置。可惜的是,这仅仅是个例。整体来看,西方的中译外翻译话语并未参与到主流的翻译话语之中,这应该是符合实际情况的判断。

目前,不少学者纷纷指出中译外理论研究的必要性。潘文国(2007)认为,“外译中”和“中译外”是相对不同的实践,需要不同的理论,在当前中译外的系统工程中,必须特别重视对中译外独特规律的研究。谢天振(2017)和许钧(2012)也分别指出,建立在“译入翻译”上的译学理念很难有效地指导今天的“译出翻译”,因此必须加强这方面的投入和研究,尤其是理论研究。张西平(2016)也认为,基于语言和哲学思维的不同所形成的“中译西”和“西译中”是两种不同的翻译实践,认真总结中译外的实践,提炼“中译外”的理论是一个亟待努力的工作。然而纵观国内外的研究可以发现,学术界对中译外翻译话语并未从学科自觉的高度进行系统的理论探讨,并不认为它可以构成一个独立的研究领域,这是令人遗憾的。

### 3. 内涵与路径

话语体系或理论体系的形成始于对知识仓库的整理和发展脉络的建构。可以这样说,中国本无自成体系的翻译理论,有自罗新璋、王宏印等学者整理和建构始。同理,中译外的翻译话语也必须经过类似的这种知识整理、分析和建构,才能形成概念和体系。至于采用什么样的研究方法和工具,笔者认为最好结合具体的研究问题和对象来考虑。

本文认为,新中国成立以来中译外文学翻译话语的研究应该包括历时和共时两个大的维度。历时强调脉络,共时侧重比较。具体而言,可以围绕以下四个中心展开研究:

#### 3.1 以行为者为中心(agent-centered)

这里借用社会学中的行为者的概念,指生产翻译话语的人和机构,而人又分为个体和群体。翻译话语的生产者指的就是那些针对翻译而发表看法和主张的个人。如果一定数量的个人构成了可以辨识的具有某种特征的群体,则会形成群体的翻译话语。机构指的是生产翻译话语的单位或传播翻译话语的媒介。

个人翻译话语研究毋庸置疑是本研究的重点和基础。它以单个的人为考察单位,研究的对象至少包括翻译家、批评家、学者、编辑等等。研究采取共时和历时两个视角,主要使用文本分析和阐释学的定性研究方法,总结单个翻译家的翻译思想或理论,或者横向比较中外翻译家翻译观的异同。比如杨宪益与戴乃迭夫妇坚守服务国家需要、传播中国文化为己任的忠实翻译观。葛浩文践

行文化协调员的身份采用跨语际重写的翻译策略。奚密从中国现代诗歌英译所蕴含的审美要素出发提炼出翻译“契合”论。闵福德在与霍克斯合作翻译《红楼梦》时贯彻“创造性的再创作”的翻译理念。华兹生在翻译中国古典诗词当中坚持“艺术性、可读性与阐释性”相结合的翻译风格。白之在处理中国戏剧《牡丹亭》的唱词时采取“自由派散体译法”以保持节律对应。陶忘机提出“引种或高级园艺”翻译隐喻和等式平衡翻译理念。欧阳桢强调的“译者就是演员”，需要开发译作的潜力而寻求和培养不同的读者的思想。马悦然倡导的译者多元身份观以及翻译必须重视“有意味的语言形式”的思想等等。

目前已有的研究考察的范围包括国内的著名翻译家如杨宪益(邹广胜 2007)、戴乃迭(付文慧 2011)、许渊冲(江枫 2001;郑海凌 2002)、沙博理(任东升 2015),海外的知名汉学家如葛浩文(孙会军 2016)、华兹生(林嘉新 2017)、杜博妮(覃江华、刘军平 2012)、蓝诗玲(覃江华 2010)等。有的研究者会对比中外翻译家的翻译观,如杨宪益和霍克斯翻译思想比较(张曼 2006;党争胜 2013)。但这种横向的对比研究数量上仍不多见。研究方法除了传统的文本分析和阐释学方法之外,还可使用访谈或口述史方法。它们常用于给当事人做现场采访的场合。比如对一些著名翻译家或翻译活动的重要参与者进行专访(潘佳宁 2016;张汨 2019),往往能重演历史,打捞细节。不得不指出,这方面挖掘的还远远不够,如来自外文局的唐笙和胡志挥,前面提到的方志彤和葛瑞汉,来自香港和台湾地区的翻译家殷张兰熙(Nancy Ing)和奚密(Michelle Yeh)等等。此外,一些著名的批评家、学者、编辑等也会发表有关翻译的看法,如李欧梵、何谷理、宇文所安、厄普代克、金介甫等人。他们并非专门的翻译研究者,发表的观点也比较分散,需要整合性研究。这一块构成了群体翻译话语研究的主要内容。

群体翻译话语研究将焦点从个体身上拉开,以长焦镜头关注具有某种相似社会身份的群体上面,考察他们作为一个整体所表达的有关中国文学翻译的观点和主张。这样做的好处往往可以发现更为宏观的带有某种规律性的知识模型。比如朱徽(2009)历时梳理了英美从事汉诗英译的翻译家群体,分析了他们的翻译理论和思想。朱振武等(2017)集中展示了英美澳三国汉学家群体的中国文学英译历程。不过两位作者在翻译话语的普遍性方面并没有做过多的分析,这方面还有待进一步的深化和提炼。

三类群体值得注意。第一类是翻译、研究和评论兼有的学者。有的从事翻译活动较多,有的则以研究和评论为主。目前的研究多以这一群体为对象,但缺乏整合性的共性分析,而从历时的角度分析 1949 年以来不同时代的汉学家在翻译话语方面表现出的某种脉络的研究则甚为少见。有的研究覆盖的时间段以 20 世纪初期之前为主。吴伏生(2012)的研究算得上一个值得关注的典范。他对从理雅各、翟理斯、韦利到庞德的汉诗英译传统做了历史的考辨与阐发,令人信服地分析了汉诗英译的目的如何从征服中国到消除误解和取法中国的转变(吴伏生 2012:433)。耿强(2018b)从副文本的角度对 16 至 19 世纪古典汉诗英译最终形成的以德庇时、理雅各和翟理斯为代表的三种翻译话语传统进行了历时的整体考察。

第二类群体纯粹以研究、评论或编辑为业。他们或专攻中国文学,或带着其他学科的专业背景,偶尔对中国文学翻译发表议论,或对某部作品表达阅读感受。他们的这些评论随感看似散漫,却有可能抒发“局外人”位置所带来的某种深刻洞见、偏见抑或不见,均具有文化症候上的特殊意义。比如英美文学著名批评家厄普代克对中国作家苏童作品的评论就具有重要的示范性,很值得重视。其实已经有学者注意到国外权威书评家的重要作用(刘亚猛、朱纯深 2015),但对翻译话语方面关注很少。严格来说,这方面的研究仍比较薄弱,原因一方面在于批评史料难以搜寻,需要长期的挖掘和积累,另一方面如何透视话语所寄身的文学和文化批评环境,并用

适切的方法进行抽丝剥茧的阐发,也是一大困难所在。对于批评史料,扩大检索范围或许能有所发现,但有时候也不要忽略可能藏在眼皮底下日见而无视的材料。实际上,中国文学译本的封底就印有我们需要的东西。出版社经常邀请著名人士给译本题写简短的广告或推荐语,含有对译本从质量到风格的评价,字数虽然不多,却是极佳的研究翻译话语的原料。编辑群体也可以成为研究的对象。他们会在图书售卖的印刷广告或网站上打出一些推荐语,构成了中国翻译话语的另一个有效来源。这些方面的研究有待人们精耕细作。研究方法上可以考虑采用语料库的关键词、搭配、语义韵等新的手段,如果能够结合文化症候分析法进行深度解剖,会使得研究更加有层次感从而显得丰满充盈。

第三类群体是普通读者。进入互联网时代以来,普通读者可以通过网络留言的形式表达对某部作品的看法和意见,这些可以成为研究中国翻译话语的宝贵资源。比如国外的亚马逊和 Goodreads 网站上留有读者的海量评论,应该引起研究者的重视。学界已经有人对上述网站上的读者快评进行了初步考察(刘立胜 2017; 缪佳、余晓燕 2019; 宁明 2016; 许宗瑞 2017),但研究方法存在明显不足,表现在分析的评论数量十分有限,以定性方法为主,优选例证进行讨论,研究结果具有很大的主观随意性。面对网络上留下的海量读者反馈痕迹,倒是可以采用大数据文本分析的方法,其步骤是首先利用网络爬虫对数据进行穷尽式采集,然后使用 Python 的自然语言处理工具包 NLTK 对数据进行清理,最后可重点进行情感分析。这样可以突破定性分析的局限,处理大规模数据。这是今后一个值得尝试的研究途径。

机构或媒介的翻译话语研究指的是考察组织翻译活动的某个机构或媒体,研究它们所表现、主张或支持的翻译话语。本文认为,最值得研究的是中国外文局,它在推动中国文学外译的过程中发挥了不可替代的历史作用。有学者就外文局推出的“熊猫丛书”和《中国文学》杂志进行了历时分析,对人们了解机构翻译的话语有了很大的推动(郑晔 2012; 吴自选 2012; 王燕 2015; 耿强 2019)。但这些研究对其他非英语的情况并无整体的考察。一些媒介包括香港《译丛》杂志(葛文峰 2014)、美国的《今日世界文学》杂志(姜智芹 2017)、网站“纸上共和国”(Paper Republic)(王祥兵 2015)和“武侠世界”(Wuxiaworld)(万金 2017),也陆续引起人们的注意。除此之外,还可以扩大研究的范围,将国外一些经常出版中国文学译本的出版社作为考察的对象,如哥伦比亚大学出版社。可以使用社会学的方法对相关人员进行采访,查阅有关的书面文件和档案等,揭开主导中国文学翻译的潜在话语机制。这应该是一个有着很大研究空间的领域,在具体实施的时候可以通过合作的方式展开。

### 3.2 以产品为中心(product-centered)

在半个多世纪的历程中,中国文学翻译实践积累了一大批风格各异的译本库,各类副文本和元文本中存有大量的翻译话语,给研究提供了充足的文本来源。

对这些话语的研究与译本译介史的研究比较接近,但后者关注的焦点并不单单在翻译话语上面。以《红楼梦》为例,我们可以研究《红楼梦》某个语种或某几个语种的译本所体现出来的翻译话语,从历时的角度梳理有关《红楼梦》翻译的选本、方法、策略、方式等方面表现出来的某种趋势性的变化或不变。这类研究的成果可以为今后中国文学的翻译提供直接和有益的借鉴(江帆 2019),也能服务于国内的典籍翻译教学,同时对一些有争议的问题提供思路或参考。比如关于中国文学应该由谁来翻译的问题,我们可以统计某个时间段内某个或一批译本的译者身份,用图表的形式直接呈现译者身份的变化,能更加直观地回答这个问题。

横向比较某个译本的翻译话语是另外一种思路。这种研究能够凸显翻译话语的时代和地域特征。以唐诗英译为例,国外形成了从理雅各、韦利、庞德到当代的斯奈德、宇文所安、华兹生等为

代表的一个以素体翻译韵体为主要特征的悠久的传统,而中国也形成了从林语堂、孙大雨、杨宪益、丰华瞻、翁显良、许渊冲到张智中、王宏印、王东风和赵彦春等为代表的以韵译韵为主线的独立传统。双方翻译实践所坚持和采用的方法背后蕴藏着更为强大的关于翻译目的和手段的潜在话语,它们在相互的比较中会见出各自的特色,都受到自身所处的文化和社会语境的影响。有学者从比较诗学的角度探讨中诗英译的理论(魏家海 2017),但作者更多以概念为中心展开诗学比较,并未突出历时的发展脉络和共时的翻译话语比较。

当上述研究积累到一定的程度,我们就可以从文类的角度,分别考察诗歌、小说、戏剧翻译话语的特征、发展和演变。这方面可以提出的问题是:文类翻译话语的内容和特征有哪些?它们之间是否存在显著性差异?如果有,造成这种差异的原因有哪些?对于后面的问题,答案是显然的。对于诗歌翻译话语而言,诗歌的韵律、声音和形式问题至关重要;小说翻译话语侧重文化专有项的处理即文化表征的忠实与否;戏剧翻译话语聚焦剧本的表演性和台词的演唱等等。除了文类自身造成了翻译话语的不同之外,其他的因素还包括一个时期文学系统内部主流诗学与意识形态之间的此消彼长,这些需要细致的辨析与阐释。

就目前的研究来看,诗歌翻译话语研究无论是历时的脉络梳理还是共时的中外比较,都有不少成果问世,但多集中在 20 世纪之前;小说翻译话语研究方面多关注个体翻译家的翻译思想或理论,缺少从文类的角度审视历史之维的流变以及中西之间的异同;戏剧翻译话语研究方面,现有的成果偏重戏剧译介史的研究路径(曹广涛 2011;孟伟根 2017;赵征军 2015),会涉及一些翻译话语的内容,但并不突出。

### 3.3 以事件为中心(event-centered)

以事件为中心指的是关注曾经发生过的有关中国文学翻译的有意义的事件。这里的事件一词有着当下和回溯两方面的含义。有的翻译批评在刚刚发生的时空中会立即引发一连串的反应,比如某批评家针对某部中国文学译作表达了自己的意见,结果随即引起其他人的关注、回应甚至是反批评,于是掀起不小的争论。有的围绕中国文学译介这一现象展开理论争鸣,往往可以激发更多的人参与,从而形成具有某种示范意义的翻译话语事件。事件的现场总是热烈的,充满着观点的交锋,背后表达的其实是不同参与者所持有的有意识或无意识的翻译观念和话语立场。解剖这些事件背后隐藏的价值预设是这一研究的主要内容。另一方面,某种翻译史实产生之后很有可能一段时间内并未引起人们的注意,但是时过境迁,当我们从特定角度进行回溯观察时,它们反而会具有不同寻常的话语意义和价值。一个典型的例子是 20 世纪 50-70 年代,中国外文局通过《中国文学》杂志和单行本译介了相当数量的反映中国革命和建设的文学作品,但基本上没有引起英美国家的注意。就在同一时期,几位研究中国文学的学者主动译介了中国的革命文学(Birch 1963; Ebon 1975; Meserve 1970; Scott 1963)。这一史实当时也并未引起人们多少注意,但如果将中西译介行为进行对比可以看出,这种忽略背后体现了某种隐蔽的意识形态和诗学规范,和翻译话语有因果关系,是值得挖掘的课题。

在本文所探讨的时间段里,有一些翻译话语事件和现象颇值得注意。比如,20 世纪 80 年代欧美批评界对“熊猫丛书”的集中评论和国内学术界(包括翻译界)对丛书的无视。“熊猫丛书”是 1981 年外文局推出的旨在推动中国文学对外译介的大型丛书,由杨宪益先生提议,具体工作放在《中国文学》杂志社里进行。杂志社 1986 年更名为中国文学出版社。这个丛书 2007 年左右停刊,前后坚持了近 30 年。丛书刚出版的 80 年代,一部分译本引起了英语世界不少专业研究者的注意,如李欧梵、何谷理、金介甫、魏登豪(Irene Wettenhall)、林培瑞(Perry Link)等人,关注的人群中间还有一些是来自中国研究领域之外的人士,如美国女作家麦娜(Walerie Miner)、媒体批评家平斯基

(Mark I. Pinsky)等。他们纷纷撰文给予介绍、批评、鼓励和支持,内容涉及选材、文学价值、翻译质量、翻译方式、翻译策略等方面。反观国内,在丛书发行的整个80年代,几乎没有谁对这个丛书有过特别的注意。惟有寥寥的几笔记录,散落在作家回忆录、访谈、资料集、前言脚注或篇幅短小的文章等处,让人知道有个叫“熊猫丛书”的出版物,至于它是干什么的,则了解甚少。两方面进行比较可以发现,中国对丛书的忽视令人困惑不解。更无法理解的是,丛书开始发行的时期正处于中国昂首“走向世界”的热烈氛围中,这种忽略就更有一番意味在里面。结合当时国内翻译研究界的情况,一方面我们将翻译视为一种技巧性的语言转换,尚未具有足够和有效的话语来分析文学外译这个独特的现象。另一方面,整个社会的大环境虽然呼吁走向世界,但其姿态毋宁说是虚心学习西方,而不是将自己的经典译介给西方认识。这里面当然有其他更为复杂的文化心态在里面,都构成了翻译话语不应忽略的对象。

第二个值得一提的是两个翻译批评事件。一个围绕北岛诗歌的可译性、世界文学等问题而引发的一场关于翻译的表征的争论;另一个是厄普代克对苏童和莫言小说英文版的批评引发的关于文学译本批评的资格问题。美国汉学家唐诗研究专家宇文所安以“什么是世界诗歌”为题批评了北岛的诗歌,认为他的诗歌所使用的意象使其具有高度的可译性,从而顺利进入所谓的世界文学,反而失去了中国文化的特质(Owen 1990)。宇文所安的批评建立在有个本源的中国文化特质的基础上,诗人的任务就是要忠实于这个源头。如果从翻译的角度看,宇文所安坚持的实际上是原文为中心的以及强调翻译的透明性表征能力的批评观。这些话语早已遭到后殖民主义的清算,值得反思。同样,厄普代克作为美国有着广泛影响力的知名批评家和作家,他对中国文学作品的评价如夏志清所言,举足轻重。厄普代克不懂中文,完全从英美文学的立场表达和阐述自己的观点,认为作品中所传递的文化价值观并不符合欧美读者的阅读期待(Updike 2005),而且他对翻译质量的批评引来了谁更有资格对译作进行评价的争论。这些争论如果深入挖掘,倒是可以引出一些值得深思的问题。这些都需要我们对中西批评语境有敏锐的把握,对中国文学在西方的译介史有清晰的洞察,这样才能有所发现。

最后,围绕中国文学的主动外译,掀起了理论方面的争鸣,比如关于谁来译介、翻译哪些作品、采取什么样的方式译介等问题,在最近十年内得到了高度关注和热烈讨论。开始的时候,人们多从翻译技巧、方法和策略的角度切入这些问题,认为中国人也有资格从事这方面的工作。随后,谢天振(2014)等学者从文学和文化交流的角度,即译介学的视角出发,指出中国文学外译不是简单的语言翻译问题,而是文学译介、文学传播和文学接受,除了要考虑翻译质量的好坏,还要考虑译作的传播与接受问题。译介学给人们提供了一个看待问题的新的视角,一定程度上影响了国内典籍外译的研究和实践。目前,人们从译介学的视角观察大中华文库这个国家机构赞助的大型翻译项目,指出它遇到的问题更多和传播与接受有关(许多、许钧 2015)。此外,莫言摘得2012年的诺贝尔文学奖也直接推动了国内译学界围绕文学外译展开广泛和深入的讨论,由于研究数量较多,这里无法一一介绍。总而言之,从历时的视角梳理以上的理论争鸣和翻译实践,可以清楚地展示出国内翻译界在中国文学外译这个问题上认识的深化,而这个深化最终体现在翻译话语上的进步,即从毫不关注文学外译到秉持语言翻译观最后到提倡文化传播观的逐步深化。

### 3.4 以范畴为中心(category-centered)

第四个方面是以范畴为中心的翻译话语研究。它研究的是翻译话语涉及哪些概念、议题、话题、主题等方面,目的在于提炼一批可以作为关键词或术语使用的概念或具有高度凝练性的陈述或表达。一般而言,中译外翻译话语会出现有关翻译选材、译者资格、翻译目的、读者对象、翻译方法、宏观策略、翻译过程、传播接受、翻译美学等范畴。和这些范畴有关的翻译话语是可以挖掘、整

理、提炼出一批具有独特内涵的关键词或术语的。这方面的研究最好结合语料库的方法,具体可以使用关键词、索引行、搭配分析等手段,检索出来一些具有一定使用频率的语段形式,或者某个阶段最常使用的高频词。

国内外部分学者已经围绕中译外提出了自成一体的翻译话语。澳大利亚汉学家杜博妮结合自己丰富的翻译经验,尤其是曾经在外文局从事中国文学翻译的这段经历,提出中国外文局的对外译介模式为威权模式,而80年代同时期的民间翻译活动则采取了礼物交换模式,即中国作家通过交换礼物,通过私人接触联系并委托国外译者翻译自己的作品。这一人类学的翻译模式其实也可以用来解释外文局的对外译介行为。本文并不同意杜博妮提出的威权模式,而更倾向于将其视为礼物赠予模式,即官方赞助的对外译介是将中国文学作为礼物赠予西方读者,并不要求立即得到回报,但最终希望能通过文学礼物换来对方同情的理解和支持。同样值得注意的是,杜博妮曾经提出文学翻译的快乐原则,这比较符合葛浩文等不少汉学家在翻译中国文学的时候所怀的心态。对于他们而言,中国文学的翻译是一件带来无限乐趣的事情,而并非一种限时完成的任务。如果翻译无法带来快乐和乐趣,译者宁可不翻。这种快乐原则实际表明译者和中国文学之间发生了深度的情感认同,产生了亲和性。这给我们带来的启发是,中国文学目前仍然是一个需要目的语阅读者或译者投入高度情感的事业,这其实并不有利于它的海外传播。

谢天振(2018)提出的译介学理论同样值得关注。译介学从文学和文化交流的角度研究文学作品的翻译,关注文学翻译过程中的创造性叛逆,文学意象的扭曲和变形等问题。它注意到影响翻译的因素主要来自目的语文化内部,因此指出接受方的意识形态、诗学和赞助人才是影响甚至是决定文学译介的决定性因素。不可否认,译介学开始的时候并未明确阐述过中国文学外译的问题,但它对文学传播规律的揭示同样也适用于中译外的情况。基于译介学的观点,谢天振提出中国文学译介必须采取本土化的译介策略。除此之外,还有很多真知灼见,值得我们归纳总结和反思。比如许渊冲(1984)兼顾汉外诗歌特点而倡导的“三美三似”论,潘文国(2014)提出的文章学的翻译理论,顾明栋(Gu 2014)倡导的读者型翻译理念。

#### 4. 结语

有什么样的翻译实践,就会有与之相适应的翻译话语。自1949年新中国成立至今,中国文学在国内和国外的译介留下了一大批有关文学翻译的认识、陈述和知识。它们如流沙坠简,散落在五花八门的文本之中,构成了有关中译外文学翻译话语的丰富的知识仓库。令人遗憾的是,中译外文学翻译话语一直处于双重边缘化的状态,在中国本土的文学翻译话语中没有得到应有的注意,在西方翻译话语系统中也无法发出响亮的声音。因此亟需对之进行整理和加工。本文认为,新中国成立以来中译外文学翻译话语可以作为一个独立的研究领域存在,它包括四个方面的内容,分别围绕行为者、产品、事件和范畴展开共时的异同比较和历时的脉络化铺展。就行为者而言,可以使用文本分析、阐释学、社会学和口述史的方法对个人、群体和机构三类对象展开考察;就产品而言,可以借助于语料库和大数据文本分析的方法对涉及单个作品或整个文类的翻译话语进行梳理和辨析;以事件为中心,可以关注观点交锋和互动批评背后潜藏的有关翻译的价值预设,可以使用症候分析法刺穿表层陈述从而抵达话语的硬核;而对范畴的关注则可以在前三方面研究的基础上,辅助使用语料库的手段,归纳提炼翻译的关键词、术语和表述,以此服务于建构具有中国风格和中国气派的翻译话语体系。上述四个方面构成了一个有机的整体,有的已经产生了较多的成果,而更多的则留给我们一片沃土,等待有心人埋头开垦拓殖。

## 参考文献:

- [1] Bassnett, S. *Translation Studies* (3<sup>rd</sup> Edition) [M]. London & New York: Routledge, 2002.
- [2] Birch, C. *Chinese Communist Literature* [C]. New York & London: Frederick A. Praeger, 1963.
- [3] Brower, R. A. *On Translation* [C]. New York: Oxford University Press, 1966.
- [4] Cheung, Martha P. Y. *An Anthology of Chinese Discourse on Translation: Volume One, From Earliest Times to the Buddhist Project* [M]. London and New York: Routledge, 2006.
- [5] Ebon, M. *Five Chinese Communist Plays* [C]. New York: The John Day Company, 1975.
- [6] Graham, A. C. *Poems of the Late T'ang* [M]. Middlesex, Baltimore, Victoria: Penguin Books, 1965.
- [7] Gu, Mingdong. Readerly Translation and Writerly Translation: For a Theory of Translation That Returns to its Roots [C]// Gu, Mingdong & Rainer Schulte. *Translating China for Western Readers: Reflective, Critical and Practical Essays*. Albany: State University of New York Press, 2014. 89 – 118.
- [8] McDougall, B. S. *Translation Zones in Modern China: Authoritarian Command versus Gift Exchange* [M]. New York: Cambria Press, 2011.
- [9] McDougall, B. S. Literary Translation: The Pleasure Principle [J]. 中国翻译, 2007, (5): 22 – 26.
- [10] Meserve, W. *Modern Drama from Communist China* [C]. New York: The New York University Press, 1970.
- [11] Owen, S. What is World Poetry? [N]. *The New Republic*, November 19, 1990: 28 – 32.
- [12] Robinson, D. *Western Translation Theory: from Herodotus to Nietzsche* (2<sup>nd</sup> edition) [C]. London & New York: Routledge, 2002.
- [13] Scott, A. C. *Literature and the Arts in Twentieth Century China* [C]. New York: Anchor Books, 1963.
- [14] Steiner, G. *After Babel: Aspects of Language and Translation* (3<sup>rd</sup> edition) [M]. Oxford: Oxford University Press, 1998.
- [15] Updike, J. Bitter Bamboo: Two Novels from China [N]. *The New Yorker*, May 9, 2005: 84 – 87.
- [16] Venuti, L. *The Translation Studies Reader* (2<sup>nd</sup> edition) [C]. London & New York: Routledge, 2012.
- [17] Weissbort, D and Astradur Eysteinnsson. *Translation—Theory and Practice: A Historical Reader* [M]. Oxford: Oxford University Press, 2006.
- [18] 曹广涛. 英语世界的中国传统戏剧研究与翻译[M]. 广州: 广东高等教育出版社, 2011.
- [19] 陈福康. 中国译学史[M]. 上海: 上海人民出版社, 2010.
- [20] 陈福康. 中国译学理论史稿[M]. 上海: 上海外语教育出版社, 1992.
- [21] 党争胜. 霍克斯与杨宪益的翻译思想刍议[J]. 外语教学, 2013, (6): 99 – 103.
- [22] 董秋斯. 1951. 论翻译理论的建设[C]// 罗新璋. 翻译论集. 北京: 商务印书馆, 1984. 536 – 544.
- [23] 付文慧. 多重文化身份下之戴乃迭英译阐释[J]. 中国翻译, 2011, (6): 16 – 20.
- [24] 葛文峰. 《中国文学》与《译丛》: 中国文学对外翻译出版模式的范例[J]. 出版发行研究, 2014, (9): 101 – 104.
- [25] 耿强. 中国文学: 新时期的译介与传播——“熊猫丛书”英译中国文学研究[M]. 天津: 南开大学出版社, 2019.
- [26] 耿强. 中译外翻译话语的双重边缘化: 问题与对策[J]. 复旦外国语言文学论丛, 2018a, (1): 170 – 176.
- [27] 耿强. 副文本视角下 16 – 19 世纪古典汉诗英译翻译话语研究[J]. 外国语, 2018b, (5): 104 – 112.
- [28] 郭建中. 进一步深入研究传统译论——探索构建中国传统译论体系[J]. 上海翻译, 2015, (1): 1 – 7.
- [29] 季进. 我译故我在——葛浩文访谈录[J]. 当代作家评论, 2009, (6): 45 – 56.
- [30] 江帆. 他乡的石头记:《红楼梦》百年英译史研究[M]. 天津: 南开大学出版社, 2019.
- [31] 江枫. “新世纪的新译论”点评[J]. 中国翻译, 2001, (3): 21 – 26.
- [32] 姜智芹. 《今日世界文学》与当代小说在英语世界的传播[J]. 外国语文, 2017, (4): 82 – 91.
- [33] 廖七一. 中国近代翻译思想的嬗变——五四前后文学翻译规范研究[M]. 天津: 南开大学出版社, 2010.
- [34] 林嘉新. 美国汉学家华兹生的诗歌翻译思想评析[J]. 复旦外国语言文学论丛, 2017, (1): 137 – 143.

- [35] 刘建珠,穆雷. 中国翻译理论话语体系的建构及其划界[J]. 上海翻译,2017,(2):1-5,93.
- [36] 刘立胜. 中国文学英译本海外传播现状与对策研究——基于亚马逊网上书店英译本的统计分析[J]. 中国出版,2017,(6):55-58.
- [37] 刘亚猛,朱纯深. 国际译评与中国文学在域外的“活跃存在”[J]. 中国翻译,2015,(1):5-12,126.
- [38] 罗新璋. 翻译论集[C]. 北京:商务印书馆,1984.
- [39] 毛泽东. 在延安文艺座谈会上的讲话[M]. 延安:解放社,1950.
- [40] 孟伟根. 中国戏剧外译史[M]. 杭州:浙江大学出版社,2017.
- [41] 缪佳,余晓燕. 麦家《解密》在海外阅读接受状况的调查及启示——基于美国亚马逊网站“读者书评”的数据分析[J]. 当代文坛,2019,(2):92-99.
- [42] 宁明. 莫言作品的海外接受:基于作品海外销量和读者评论的视野[J]. 南方文坛,2016,(3):70-74.
- [43] 潘佳宁. 《毛泽东选集》第五卷英译的前前后后——北京外国语大学陈琳教授访谈录[J]. 东方翻译,2016,(2):57-62.
- [44] 潘文国. 译文三合:义、体、气——文章学视角下的翻译研究[J]. 吉林师范大学学报(人文社会科学版),2014,(6):93-101.
- [45] 潘文国. 中籍外译,此其时也——关于中译外问题的宏观思考[J]. 杭州师范学院学报(社会科学版),2007,(6):30-36.
- [46] 潘文国. 译入与译出——谈中国译者从事汉籍英译的意义[J]. 中国翻译,2004,(2):40-43.
- [47] 庞秀成. 翻译理论“一分为三”的视域[J]. 外国语,2010(3):80-88.
- [48] 覃江华. 英国汉学家蓝诗玲翻译观论[J]. 长沙理工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2010,(5):117-121.
- [49] 覃江华,刘军平. 杜博妮的翻译人生与翻译思想——兼论西方当代中国文学的译者和读者[J]. 东方翻译,2012,(2):49-58.
- [50] 任东升. 从国家翻译实践视角看沙博理翻译研究的价值[J]. 上海翻译,2015,(4):25-28,90.
- [51] 孙会军. 葛浩文和他的中国文学译介[M]. 上海:上海交通大学出版社,2016.
- [52] 邵有学. 中国翻译思想史新论[M]. 北京: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2018.
- [53] 谭载喜. 中西译论的相似性[J]. 中国翻译,1999,(6):25-28.
- [54] 万金. 网络武侠小说在英语世界的传播——以翻译网站 Wuxiaworld 为例[J]. 东方翻译,2017,(5):27-33.
- [55] 王秉钦. 近现代中国翻译思想史[M]. 上海:华东师范大学出版社,2018.
- [56] 王秉钦. 20世纪中国翻译思想史[M]. 天津:南开大学出版社,2004.
- [57] 王宏印. 中国传统译论经典诠释——从道安到傅雷[M]. 武汉:湖北教育出版社,2003.
- [58] 王祥兵. 海外民间翻译力量与中国当代文学的国际传播——以民间网络翻译组织 Paper Republic 为例[J]. 中国翻译,2015,(5):46-52,128.
- [59] 王燕. “熊猫丛书”中的中国典籍英译及相关思考[A]. 王宏印、李正栓主编. 典籍翻译研究(第七辑)[C]. 北京:外语教学与研究出版社,2015. 350-359.
- [60] 魏家海. 汉诗英译的比较诗学研究[M]. 北京: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2017.
- [61] 吴伏生. 汉诗英译研究:理雅各、翟理斯、韦利、庞德[M]. 北京:学苑出版社,2012.
- [62] 吴自选. 翻译与翻译之外:从《中国文学》杂志谈中国文学“走出去”[J]. 解放军外国语学院学报,2012,(4):86-90,128.
- [63] 谢天振. 译介学导论(第二版)[M]. 北京:北京大学出版社,2018.
- [64] 谢天振. 本土化:跨文化交流的基本规律[N]. 中国社会科学报,2017-5-26,第006版.
- [65] 谢天振. 中国文学走出去:问题与实质[J]. 中国比较文学,2014,(1):1-10.
- [66] 许多,许钧. 中华文化典籍的对外译介与传播——关于《大中华文库》的评价与思考[J]. 外语教学理论与实践,2015,(3):13-17,94.
- [67] 许钧. 从国家文化发展的角度谈谈翻译研究和学科建设问题[J]. 中国翻译,2012,(4):5-6.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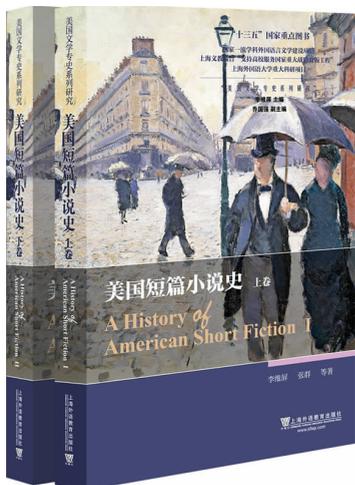
- [68] 许渊冲. 翻译的艺术[M]. 北京:中国对外翻译出版公司,1984.
- [69] 许宗瑞. 莫言作品的国外读者评论——基于亚马逊网站莫言作品英译本“用户评论”的研究[J]. 中国出版,2017,(6):55-58.
- [70] 邹广胜. 谈杨宪益与戴乃迭古典文学英译的学术成就[J]. 外国文学,2007,(5):119-124,128.
- [71] 张曼. 杨宪益与霍克斯的译者主体性在英译本《红楼梦》中的体现[J]. 四川外语学院学报,2006,(4):109-113.
- [72] 张汨. 中国文学的海外传播:译者主体视角——汉学家、翻译家蓝诗玲访谈录[J]. 外语学刊,2019,(1):110-115.
- [73] 张佩瑶. 重读传统译论:目的与课题[J]. 中国翻译,2008,(6):4-10,92.
- [74] 张思洁. 中国传统译论范畴及其体系[M]. 上海:上海译文出版社,2006.
- [75] 张西平. 编后记:突破西方翻译理论,探索中译外的实践与理论[J]. 国际汉学,2016,(2):198-199.
- [76] 赵征军. 中国戏剧典籍英译研究——以《牡丹亭》的英译与传播为中心[M]. 北京: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2015.
- [77] 郑海凌. 解读“优势竞赛论”[J]. 外语与外语教学,2002,(8):42-45.
- [78] 郑晔. 国家机构赞助下中国文学的对外译介——以英文版《中国文学》(1951-2000)为个案[D]. 上海外国语大学博士论文,2012.
- [79] 朱徽. 中国诗歌在英语世界——英美译家汉诗翻译研究[M]. 上海:上海外语教育出版社,2009.
- [80] 朱振武等. 汉学家的中国文学英译历程[M]. 上海:华东理工大学出版社,2017.

收稿日期:2019-10-14

作者简介:耿强,男,博士,副教授。研究方向:中国当代翻译话语、翻译叙事与副文本研究、中国文学外译研究。

## 书 讯

### 美国文学专史系列研究:美国短篇小说史(上下卷)



ISBN:978-7-5446-5736-5

作者:李维屏 张群 等著

出版时间:2020年5月

《美国短篇小说史》旨在全面阐述美国短篇小说的起源和发展,深入探讨这一文学样式的美学原则、艺术特征和解读方式。在系统梳理美国小说一百五十余年发展轨迹的同时,本书详细评述了美国各个历史时期重要作家的优秀作品,包括现实主义、现代主义、后现代主义短篇小说以及非裔作家和女性作家的作品。本书借鉴了当代文学批评理论,多视角、多层次地分析美国短篇小说的人物美学、叙事策略和谋篇技巧,并使有关这一文学样式的一系列深层次问题得到深刻的诠释。